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练好内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构建以中国经验为本位、以中国话语为依托的清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深入挖掘我国清史研究成果丰硕、人才集中、社会关注度高的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两个阵地，综合运用学术、传媒、舆论资源，打通研究、阐释、传播渠道，加强专业学者与优质新媒体从业者的协同联动，正本清源、补偏纠谬，讲好清代历史故事，用正确的清史观说服人、影响人、感召人，提升清史正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是加快打造清史研究学术共同体。整合队伍、统筹资源是当前和今后清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要适时筹建清史研究专门学会，以高水平论坛、刊物、项目为纽带，在确保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前提下，将更多立场正确、知华友华的海外清史学者“引进来”，鼓励国内优秀清史学者“走出去”，支持和引导中外学者围绕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展开联合研究，推动海内外清史研究史料共享、数据互通，在交流互鉴中扩大学术共识，构建清史研究学术共同体，进一步营造有利的学术生态和舆论环境。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

马 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素有重史、学史、修史的传统。进入新时代以来，历史和历史研究更是受到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更加重视历史研究在传承文明、资政育人中的作用；更加注重从历史连续性中观察当今社会及思想的演变；更加注重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受时代潮流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亦呈现若干新的趋向或新的追求。^①

^① 因本文系围绕新时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趋势的笔谈，篇幅有限，故对一些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向仅点到为止，不做过多的引证与展开。

一、以话语体系建设为突破口，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离不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即“三大体系”建设。就三者关系而言，学科体系建设是基础，学术体系建设是核心，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任何知识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一整套由术语、概念和范畴构成的完整学术话语体系。因此，自主话语体系建设自然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突破口。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近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格外受到关注。冯天瑜、沈国威等对来自日本的近代汉字名词、术语进行的文化探源研究，方维规、李宏图、孙江、黄兴涛等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桑兵、章清、杨念群等展开的近代知识转型研究，^① 皆其著例。这些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众多名词、术语、概念、观念、知识范畴的系统梳理和文化探源，透视其背后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变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概念史、观念史相关研究，也引发了如何从根源上建立近代中国本土化“知识体系”的思考。例如，孙江提出进行概念史的“知识考古”，追溯近代各种新概念的来源；^② 黄兴涛提出将概念史纳入“历史化”“社会化”之中探讨，强调对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和思潮进行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须“深入考察其内在的概念群特别是核心主题词的产生、传播和社会认同”。^③ 笔者则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结合概念史、观念史建构自主话语体系，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以中国为本位，对近代史上的名词、术语、概念、观念进行分类梳理，鉴别其内在属性；二是以历史发展大势为观照，判定哪些概念、观念在推动历史实践与历史变迁上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三是在“话语”分析基础上对众多概念、观念进行整合，以形成既包罗宏富，又具有明确指向和内在逻辑关联的话语体系。而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为相

① 参见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92~100页。

② 参见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③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78页。

关概念、观念的“历史化”“社会化”“系统化”提供更为宏观的理论思维框架，确立概念整合的标准和原则；进而提出可围绕“近世”与“近代”、“天下”与“万国”（“世界”）、“国家”与“社会”等这类更为核心的概念，对近代史上众多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进行相应溯源与整合，为建立系统的学术话语体系奠定语言学基础。^①

二、在全球史观影响下，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对话日益加强

最近二十年间，一种全新的史观——“全球史”风靡世界历史学界。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将近代中国放到近代世界的总体格局中观察，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绝对界限渐趋淡化，全球学术正以更加直接的形式和更为便捷的通道，进入中国学术场域。

学界固然依然重视国别史、地方史的研究，却赋予国别史和地方史以世界视野与全球性关怀。学者们不再孤立地讨论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联系之中，从各国的相互依存之中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真正的史学家叙述任何一段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指出这些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蕴含。”^②典型者如思想史家葛兆光提出中国史研究应“从周边看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织的文化网络之中反观历史的、文化的“中国”，重建以周边为“他者”的新参照系统，书写一部“交错的文化史”。^③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藩篱的撤除，无疑有助于用更宏阔的视野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在一些纯粹的地方史研究中灌注全球性问题意识，将其纳入“地域全球化”（lobalization）范畴来认识。比如，在讨论“地方性社团”“地方性教会”“地方性博览会”或“地方的辛亥”“地方的五四”“地方的近代化”时，强调关注其全国性、国际性联系，在一个更大的网络系统中讨论地

① 参见马敏：《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以“近代”“近世”等概念为论述中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第4~9页。

② 转引自[加]格利高里·布卢：《中国与西方世界史的书写》，孙岳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4~295页。

方性问题。^①

全球史观的引入和与世界史进程相联系，无疑有助于从“空间传动”与“空间转向”等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一些过去忽略的领域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如具有跨国性质的环境史、海洋史、贸易史、旅行史、传教史、世博史、艺术史、食品史、习俗史、性别史、灾害史、国际组织史等。在“时间”之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亦随之大为扩充。伴随历史运动横向展开的巨大势能，新的历史时空观亦随之而产生，这就是全球史专家们所称的“历史在（空间）移动之中（history is movement）”。^②“空间史”与“时间史”受到同等重视，新的跨国史、跨文化史、共享历史（sharing history）潮流随之兴起。

三、打破学科壁垒的“跨界”与“交叉”已成新常态

受跨学科思维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不再固守各自的藩篱，经营传统学术的“一亩三分地”，学科交叉、领域交叉、时段交叉成为时下日趋明显的变革趋势。学科交叉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各学科的方法，已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之中，突破单一学科界限，形成多元视角与多重解释。领域交叉上，不少研究注意到文化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以及政治中的社会因素等，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城市史与乡村史、宗教史与社会史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叉融合：从地域社会观察政治变迁，从宗教信仰探讨村落社会，从农业垦殖和水利建设反思生态观念，由此形成产生于诸多交叉领域的新成果。^③

① 如一些商会研究者强调的江浙地方商会的全国性社团网络联系及其与海外华商会之间的国际联系。参见[加]陈忠平：《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另可参见马敏、朱英、虞和平的早期相关著作，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

② 参见刘新成：《从国家交织中寻找“全球”：越界的全球史》，《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4期，第152页。

③ 有学者从法律史、社会史与政治史的交叉角度，探讨近代鄱阳湖区水域渔业纠纷的调解过程，提出湖区国家权力因子、宗族社会势力、传统惯常因素等各种力量相互博弈，既形成湖区渔业捕捞生产实践的内在逻辑，也构建起该地基层社会自治与他治的公共秩序与动态场景。参见程宇昌：《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中的传统惯例》，《学术月刊》2024年第6期，第190~200页。

时段交叉上,许多研究不再固守于某一特定时段,而是不断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学者们更加注重“拓展两端”,即近代史中的前端(1840—1884年)和后端(1945—1949年),更加重视史事的贯通性、连续性。例如,有学者认为贯穿“近代”与“古代”的“嘉道年间”(1795—1850年),便是清朝由盛转衰、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交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危机不断,各种新事物也不断浮现,十分值得重新加以研究。^①又如,晚清政治史研究更加关注咸同以后清廷内部格局与央地关系演化;中国革命史研究更加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北洋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民国史的过渡阶段,其复杂性和动荡性受到更多关注。再如,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也是一个交叉、过渡时期,有很多亦新亦旧的事物和问题值得重新发掘、研究,近期一些研究者关注的建国初期国有企业的性质及来源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家副业涉及的大集体与小自由问题、建国初期发行的日历体现的旧习俗与时代新风问题等,都是较新且很有意义的课题。

四、“碎片化”倾向有所扭转,注意在具体研究中注入整体性思维

一度比较明显的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因近期研究中更加注重在“碎片”中灌注整体性思维而多少得到了纠正。学者们通过理论探讨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正着力构建中国近代史自主知识体系,力图将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和细节的研究,纳入更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中予以说明,赋予“碎片”连贯性和深刻性。例如,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历史因素的探讨,便试图打破“近代”与“当代”的界限,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视距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寻觅文化的基因、历史之渊源,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其实,早期现代化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解决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破解后发现代化、落后国家现代化之困,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深层次社会结构、文化转型方面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进行贯通式、长时段

^① 参见朱浒:《盛衰之理:关于清朝嘉道变局性质的不同阐释及其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第88~99页。

研究。^①

在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历史学与现实发展之间的互动日趋密切，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热点领域往往随时势迁移而变化。^② 比如，2024 年为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130 周年，甲午前后政局自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成为当年的研究热点。2025 年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高潮也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纷纷召开便是证明。这充分说明，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不容忽视；常规性研究与突破性研究常常是交相迭现、相互促进的。“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是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中不可忽视的中心议题之一。^③

五、“数字史学”受到高度关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史学形态

在大数据时代，史料搜集、利用的途径和方法已有根本性变化，纸质史料的数字化及可检索化，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率，为此，必须运用大数据历史方法改进传统史料搜集手段，发掘新资料，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④ 诸如北京爱如生公司开发的“申报数据库”和“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青苹果数据中心开发的各类近现代报刊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发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台湾政治大学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

-
- ① 参见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历史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21~29 页；虞和平：《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4~17 页。
- ② 参考中国历史研究院自 2020 年起每年度发布的“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可明显地观察到近五年来历史研究热点随时势的迁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每年都有与当下历史进程紧密结合的不同的重点研究议题。
- ③ “参与史学”是已故史学大家章开沅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提倡历史学家不能只做历史进程的旁观者，而是必须具有一种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参与现实生活，并且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参见章开沅：《走出中国近代史》，北京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34 页。
- ④ 参见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67~82 页；梁晨：《1909—1944 年清华留美学生职业状况量化研究》，《近代史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21~43 页。

据库(1830—1930)”、浙江大学的“蒋介石资料数据库”等历史文献类数据库,以及香港科技大学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等研究型数据库(又称结构化历史数据库),可谓琳琅满目。^① 这些历史文献类数据库及研究型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不仅极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目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为开展长时段、整体性、宏微观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②

与此同时,数字史学不再仅仅关注历史数据库建设,而是通过海量数据采集和分析,渗透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强化了历史学的量化研究。尤其在经济史、社会史领域,统计方法与计量研究的运用已成常态,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利用大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也已有不少成功案例。^③ 以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与历史学科相结合,使古老的史学开始焕发青春;在“数字化转向”(digital transformation)大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扩展应用,正从多个层面展现出深度赋能史学研究的巨大潜力,人机对话与合作正成为不可阻挡的史学研究新潮流。^④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新时代历史学变革浪潮中,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或许才刚刚显现,或许已处于其初期发展阶段,但沿着这些方向持续努力,不断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加以积累,假以时日,终将建成立足本土、影响世界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参见马敏、薛勤:《大数据历史与新文科建设》,《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第28~37页;康文林:《构建中国量化历史数据库学术共同体》,《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50~156页。

② 参见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第172~176页。

③ 参见陈志武、林展:《量化历史研究拓展对中国长期发展史的认知》,《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29~136页。

④ 参见马敏:《数字史学:何以成学?》,《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44~149页。